

## 郑观应商战思想探源

张 灏

郑观应(1842—1921)是中国近代由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名代表。他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其经历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相始终。因亲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而有慨于国家危亡,遂发愤“著书欲学贾长沙(汉贾谊)”<sup>①</sup>,用文字宣传其变法图治的改良思想。所著《盛世危言》一书内容颇富,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理论代表作,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较大的启蒙作用。

关于郑观应一生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及其政治经济主张,经济史学界已有较多专著专论议论得失,本文不欲多及,惟“商战”这一核心思想追溯渊源,略述浅见,以求正于同志们。

中国近代,郑观应首先同时使用“兵战”、“商战”这样两个概念。他把“兵战”又称作“有形之战”或“形战”;“商战”又称作“无形之战”或“心战”。这是根据“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的掎克,敝国无形”;“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的认识得来的。他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采用的是兵、商兼用的两种侵略,中国亦应有两方面的准备:“练兵将,制砲船,备有形之战,以制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同西方各国那样“以商富国,以兵卫商”,并且把重心放在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方面,最后“决胜于商战”<sup>②</sup>。

“商战”即经济战。一般说来,是要通过对外贸易中的商业竞争,击败对方,使自己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处于有利的地位。商业竞争虽则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实则以本国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先进水平为基础为后盾,要求国民经济全面的高度的(相对)发展,创造出数量多,质量高的产品,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郑观应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宜设专厂制造机器。”<sup>③</sup>又说:“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sup>④</sup>虽然当时中国还不具备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的条件,但是把问题提到生产领域来,强调从基础抓起,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从长远考虑,却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国民经济各业之间的关系,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农牧为工本,工是商之母”<sup>⑤</sup>。表明他也主张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他还针对清政府、洋务派封建官僚所持种种“困商之虐政”,强调指出:“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

止。或集体，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sup>⑥</sup>

可见，郑观应的“商战”，其范围不仅限于狭义的商业，而是包括国民经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部门，以及各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营。它体现了郑观应以商业为中心，在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整个思想体系。

商战思想的基本精神有如上述。郑观应既主张在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为什么却要以商业为中心，采用“商战”这一经济范畴来表达？思想来源于何处呢？

商战思想产生、形成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向中国的传入还只是初步的。甲午战争前，除1867年北京同文馆开设过“富国策（经济学）”课、1882年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福塞特的《政治经济学提要》（当时定名《富国策》）在上海出版以外，没有翻译出版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虽然“商战”思想反映了较浓厚的重商倾向，如夸大流通的作用，力图通过对外贸易求富求强等。但总的说来，郑观应并非探讨财富的生成，而是希望带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并非鼓吹对外侵略，拓土开疆，而是设想防御侵略的措施。因此，我们不认为“商战”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重商主义有什么必然联系。它仍然是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经济思想。中国社会既有其产生的现实动机，又有其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换言之，它既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又是中国历史已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

第一，存在的决定意识，“观念性的东西却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sup>⑦</sup>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已逐步的形成。郑观应就生活在中国社会急骤变化着的时代。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到上海学生意，先后在外国洋行渡过二十余年的买办生涯，嗣后又自营企业，并参与洋务派的企业经营活动。他后来自称这段经历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sup>⑧</sup>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不过郑观应确是十分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事实，也十分了解西方国家以鸦片贸易开其先，商品倾销继其后，进而割地投资经营的事实。他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时候，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时开始，中外贸易已经改变了除鸦片以外仍处顺差的格局，外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迅速增加，大有逐渐垄断中国市场的趋势；进而又进行资本输出，居中土而经营之。这就使中国民族经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危害。主权渐丧，利权尽失，“疮痍满目凄凉甚”，使得置身经济之域的这位民族资本家“伤心惨目”<sup>⑨</sup>，产生强烈地爱国激情。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在郑观应看来，这场战争不是靠军事取胜，而是经济取胜，必须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方面，以改变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他针对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在军事上的不中用，甚至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sup>⑩</sup>的意见。

由此可见，“商战”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它与所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巨大压力有关。我们说“商战”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没有必然的理论袭承关系，但却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以及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在受害国人们思想上所激起的反响。我们承认这种反响。郑观应“商战”思想是资本主义国家对 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直观反映。

第二，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产生并为之服务的重本抑末（又称重农抑商）思想，

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西汉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原则，被封建仕僚们所尊崇。到了近代，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还不十分明显，还没有什么可能冲击这种传统的思想。后来，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外部打入中国，一时间亦还不可动摇中国传统的封建信条。所以，洋务派封建官僚虽然模仿西方建立了一些新式企业，但经营管理落后，封建衙门习气颇重；经费由财政拨款，不计成本，盈亏自流，舞弊多端，贪污成风，对社会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所办企业之后亦逐步建立了一些，却难突破封建官府设置的重重障碍。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千方百计地压抑和控制私营资本的发展，所谓“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均为传统“抑商”思想的恶劣表现。

这种状况，客观上就需要从思想上打开局面，建立为新的阶级，新的生产经营方式服务的理论，以代替旧的僵死的教条。“抑商”思想严重束缚经济发展，它也自然成为首先要破除的对象。早在四十年代初期，魏源就曾赞赏“西洋以商立国”<sup>⑪</sup>，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sup>⑫</sup>表示了与传统习惯势力相违悖的见解。七十年代开始，王韬、马建中、薛福成、陈炽等人，都曾先后批判“重本抑末”的传统教条，反对清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执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sup>⑬</sup>，反对洋务派封建官僚对私营工商业“遏抑剥损”，主张重视商业，发展商务，更要求政府对商人的经营活动“调剂翼助”<sup>⑭</sup>，以促成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薛福成就曾突出地强调商业的作用说：“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sup>⑮</sup>王韬将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归结为“兵力”、“商力”<sup>⑯</sup>两种形式，并要求中国亦应准备这两手来对付侵略。郑观应在他们之后，对商业作用的认识与薛福成差不多，如他说：“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sup>⑰</sup>而对王韬“兵力”、“商力”的概念，却作了非常重要的修改。针对资本主义侵略的两手政策，提出了“兵战”、“商战”，主张即“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围绕“商战”设想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反映了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重商倾向意识的成熟形态。

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本身，会产生顺应变化的某种认识，而且会使这种认识不断深化、完善和成熟。同一经济现象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类似的认识和见解，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互相启发，形成合乎逻辑的范畴、观念和比较系统的学说。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正是这样。它是受到传统的“重本抑末”封建意识压抑的反响，也是顺应中国近代经济关系变化的产物。它既是个人独立的认识，又是对相同社会意识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比较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特点的思想体系。

第三，一个时代的经济思想，虽然根源于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中，同时又“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sup>⑱</sup>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面对资本主义侵略，民族危亡所承担的压力，迫使许多人都在思考问题。当时，不仅需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自己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且需要建立符合国情的思想原则，来指导当时自强求富的运动。按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传

统，引经据典，给自己的言论贴上“圣人之言”的标签，往往便被视为合于国情，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因此，无论招换亡灵而搞倒退的人，还是坚持变革的先进人物，皆从中国史籍宝库中搜寻资料，证说己见，以加强自己言论的说服力，只是目的不同，取舍各异。郑观应是坚持变法改良的一派人物，他也毫无例外的从中国史籍中稽求，发现“重农抑商”的记载充塞历史文献，而对商业持“畸重者，《管子》以外不数觐”<sup>⑩</sup>。

《管子》所重视的不是私营商业，而是国家经营的商业，且以这种商业作为管理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对郑观应来说，问题不在《管子》所坚持的商业经营方式，而是《管子》著作中对商业作用的描写，只要找到古人也重视商业的记载就够了。找到了《管子》，郑观应的“兵战”、“商战”、“有形之战”、“无形之战”、“兵战祸显”、“商战祸大”等这一系列概念，也便不难找到来源。

《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大政治家管仲所作，实则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战国秦汉以来多人的著作辑。其中有《轻重》十九篇（三篇亡佚，现只存十六篇）是专门讨论财政经济的。《轻重》作者假托管仲的政策，以阐述封建国家经营商业的理论。它用供求关系解释商品、货币的轻重，认为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是：“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受产量影响），散则轻，聚则重（囤集的作用）”；“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年岁丰歉的影响）”<sup>⑪</sup>；“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季节的影响）”<sup>⑫</sup>；“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家征收政令的影响）”<sup>⑬</sup>等几方面。从而主张封建国家经常掌握这些因素，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其中这样写道：“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橐（huàng音谎，帛屏之属。借指财政收支）可得而平也。”<sup>⑭</sup>意思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随时掌握市场情报，作到在商品供过于求时以低价收买积贮，供不应不求时高价出卖抛售。这样国家就会常有成倍的收益，财政也就不会发生困难。这是《管子·轻重》作者对内管理经济的基本意见。它对于郑观应商“握四民之纲领”的认识无疑是一种启发。但因郑观应对在国内做生意还没有更多具体设想，尚看不出明显的影响和继承。

《轻重》作者还主张把商品、货币供求关系的这种所谓“轻重之数”用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斗争，以压服吞并诸侯国，发展扩充势力。其中有不少以商灭人国的具体记载，联想当时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处境，使人怵目惊心。郑观应“商战”的一些设想，大概不外借鉴于此了。

据《轻重戊》篇的记载，齐国之所以富强甲天下，所用的就是“轻重之数”的欺榨贸易，致使许多诸侯国灭亡于“无形之战”中。如降服楚国的记载是这样：

“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

这里所谓“战斗之道”即是经济竞争，也就是商战。管仲为齐桓公出谋定计，用高价收购楚国所产生鹿。其具体作法是：

“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轻重，藏谷什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

这是给楚国精心设计的圈套。说的是齐国在自己的边境围城，高价收买生鹿，伪装要大规模长期饲养经营的姿态；暗地里却发展自己国家的农业，通“轻重”之数以广积粮食，以为将来之需。楚国竟然上当了，假象迷惑了楚国君民。楚王喜得金钱而忘了“修谷”，“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因为男女民众皆为捕捉生鹿奔命，就使自己的

农田荒弃无收，出现了严重的粮荒。齐国又于此时下令拒收生鹿。楚王始为着忙，可已来不及，“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余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莘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此为降服楚国的大体情形。用同样的办法，以高价收购鲁梁的高级丝绸，莒国的山柴，代国的狐白皮，衡山国的机器，等等。致使这些国家君民逐眼前之利而荒废农业，粮食价格暴涨，而齐国则以充足的粮食贮藏，用低廉的粮食价格招徕各国民众，达到了降服这些国家的目的。

《轻重戊》的这些记载，不正是当时所进行的商战！又不正是以商灭人国的“无形之战”么？我们尚且不去追究春秋时是否曾发生过如同记载这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历史已有的思想资料，它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无意谴责《管子》作者所宣扬的这种贸易欺榨行为，评价这种轻重理论的周密或疏陋，作为历史已有的思想，它对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形成确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郑观应并未怀疑《管子》著作的真伪。他完全相信《管子》著作中的记载，就是春秋时大政治家管仲之所为。从而无限敬佩管仲，十分赞赏他所制定的政策。他写诗说：“贤哉管夷吾，相齐有所务。武备图讲求，工商亦保护。”<sup>⑭</sup>夷吾为管仲之名。讲求武备，保护工商，大概就是“兵战”“商战”了，郑观应夸赞管仲的最大功绩也正在此。从这首诗不仅表明“商战”思想与《管子》的联系，而且表明他希望政府中能有如同管仲一样大有力的人来推行“商战”主张，以管理和发展经济，进而以展他挽救危亡的远大抱负。

至此，我们说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历史渊源来自借鉴《管子》的记载，大概不会有同志认为太武断吧。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有西方列强的压迫，内有封建经济关系和传统思想的控制和束缚，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更不可设想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商战”中获胜。但它却反映了郑观应强烈的爱国情绪，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研究和学习“商战”思想也可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特别在当今以全球为舞台的贸易交往中，郑观应关于“商战”的一些设想，对我们现在考虑问题也仍然有着借鉴意义。考究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根源，则更可以对我们一种启示：中国历史上可以继承的东西很多，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总结和继承这部分遗产，就能更好地发挥历史遗产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我们所进行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特点的。研究外国当前和历史上的某些思想，吸取其精华以为我用是重要的，但妄自菲薄，置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思想遗产于不顾却是不可取的。

## 注 录

- ①⑤⑩⑭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 ②④⑩⑭ 《盛世危言·商战》。  
③ 《盛世危言三编·商务五》。 ⑥⑮ 《盛世危言三编·商务二》。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⑧ 《盛世危言后编·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转引自《洋务运动》（八）。  
⑪ 魏源：《海国图志·夷情备采下·贸易通志》。 ⑫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⑬⑯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⑭ 王韬：《弢园尺牍·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⑰ 王韬：《弢园尺牍·上丁中丞》。  
⑱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页。  
⑳㉑㉒ 《管子·国蓄》。 ㉓ 《管子·七臣七主》。